

论公平与效率

——关于公平与效率的理论分析和历史考察

周平轩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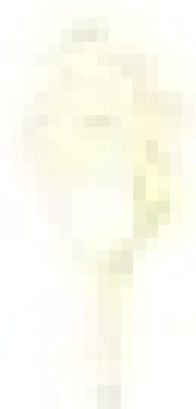


山东大学出版社

论公平与效率

——关于公平与效率的理论分析和历史考察

周其成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论公平与效率

——关于公平与效率的理论分析和历史考察

周平轩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公平与效率:关于公平与效率的理论分析和历史考察/周平轩著.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4.8
ISBN 978-7-5607-5095-8

I. ①论… II. ①周… III. ①公平与效率—研究 IV. ①F0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78437 号

责任策划:陈佳意
责任编辑:姜 明 陈佳意
封面设计:张 荔

出版发行:山东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0 号
邮 编 250100
电 话 市场部(0531)88364466

经 销:山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济南景升印业有限公司
规 格: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22 印张 380 千字
版 次: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9.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前 言

本书是作者在2006年12月完成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围绕“公平和效率”这一人类社会中的基本命题,就“公平与效率的本质内涵”以及“公平与效率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动态演化”这两个核心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和历史考察。

第一章,从人类思想演化历史的角度,考察了公平和效率的概念和思想演化,从西方思想史、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中国思想史三个方面进行梳理和分析,辨析其合理性和局限性,以求正本溯源,为构建一个科学的公平效率理论奠定思想史的基础。通过考察发现,人类社会各个阶段的思想流派中,一般都隐含着公平效率一致论的思想,均认为只有实现了公平正义,社会才能安定有序。即使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那里,公平与效率仍然在逻辑上是一致的。

第二章,鉴于当代政治思想理论、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和管理理论在当代公平效率思想上的重要地位,就三个领域中的公平和效率思想分别进行归纳和评析,辩证其合理性和谬误。通过考察发现,在与实践联系比较紧密的西方管理理论中,人们对报酬公平与否的评价直接影响到其工作行为,公平与效率之间仍然呈高度一致的逻辑关系。而在自由主义思想主导的政治思想和经济理论中,出现了分野。

第三章,对我国改革开放后国内学者关于公平效率的代表性观点以及中央政策演变进行了总结和评析,从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主义应然意义上的公平一致论,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公平效率冲突论占主导,然后是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实然意义上的公平效率统一论;分析了这些观点和政策的社会成因、合理性和局限性,论述了在我国正确认识公平和效率及其相互关系的重大现实意义。

第四章,在鉴古察今的基础上,对公平和效率的概念、内涵进行重新思辨和论述,对公平的客观性、相对性、阶级性、历史性等基本属性和公平标准

进行了探讨;同时也考察了效率的客观性和相对性、经济效率的内涵和标准,并就当前比较通用的 GDP 增长率和帕累托标准进行了评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本书的核心论点——公平效率同向促动关系:效率的提高,意味着为人类实现更大的福利以及更高程度的公平提供了效能基础和物质前提;而公平的实现一方面能够把大多数人的积极性、能动性充分调动起来,另一方面也为大多数人提供更加广阔的发展机会,因而必然意味着对效率的促进。因此,二者之间是有机统一的,这种有机统一具体表现为同向变动、相互促进的同向促动关系。最后,通过构建一个具有公平认知的新经济人基础上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通过模型化的数理逻辑论证了这种同向促动关系,初步揭示了促动关系中的一些规律。

第五章,在对国家、制度、技术和阶层进行单独考察辨析的基础上,把公平效率纳入国家、制度、阶层和技术四者的交互影响、互相制约的互动演化框架中分析,也就是在一定的技术水平所支撑的社会生产方式中,在以国家为主体的社会管理组织所制定的制度框架内,在社会各阶层势力交织互动的社会背景下,全面考察社会利益分配结构的形成及演化,进一步揭示了公平效率之间同向促动的演化规律和机制。

第六章,运用第五章建立的分析框架,对从原始社会一直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公平效率形式及演化进行了历史考察,着重揭示二者在动态演化中相互作用的具体机制,从历史逻辑的角度进一步丰富和验证了公平效率同向促动论。

第七章,对前苏联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改革实践中的公平效率关系进行了回顾总结,论证了社会主义由于在所有制方面较好地解决了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平等,而在实现公平效率的良性促动方面显示出了巨大的优越性;也揭示了因为没有处理好公平效率问题而使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了挫折。

第八章,介绍了国内外收入分配方面实证研究的基本方法,对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进行了综述,然后就公平与效率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四个方面的实证分析。一是就世界 118 个国家分别以 38 年、11 年和 5 年的时间跨度进行总括式分析。二是根据国家发展程度、基尼系数类型和基尼调查年份,分成 12 组进行国别比较。随着统计分析的细致深入,收入均等程度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正向相关性也愈加显著。三是在综合多方数据的基础上,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收入均等程度与经济增长效率进行了相关统计分析,初步印证了二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四是为进一步验证各国发展效能而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率与经济公平之间的相关性,对 124 个国家的发展效

能与收入均等程度地进行了统计分析,通过了统计显著性检验,论证了经济公平与发展效能之间存在着严格的正相关关系。

第九章,对我国社会公平的现状进行了全面介绍,论证了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属性,从社会现实和社会属性这两个方面界定了我国公共政策的基本取向。在此基础上,就我国现阶段实现公平与效率的良性促动关系,提出了一些基本层面的政策建议,认为首先要从根本认识和执政理念上剔除公平效率对立冲突论的有害影响,更加自觉地把握住公平这个社会制度中的能动因素,以此来推动公平效率的良性促动。

作 者

2014 年 6 月

目 录

引 论	(1)
第一章 公平与效率思想的历史溯源	(3)
第一节 西方思想史中公平效率思想的演化	(4)
第二节 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对人类公平效率思想的巨大贡献 ...	(21)
第三节 我国传统的公平效率思想	(26)
第二章 现代西方学者关于公平效率思想的论述	(30)
第一节 现代政治理论中的公平效率思想	(30)
第二节 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中的效率与公平思想	(42)
第三节 西方管理学中的公平激励理论	(52)
第三章 新中国公平效率的政策导向及理论观点	(57)
第一节 我国分配领域中公平效率的政策演化	(57)
第二节 我国理论界关于公平效率问题的争论	(64)
第三节 对我国政策实践以及学界理论观点的评述	(74)
第四章 公平效率内涵及相互关系	(79)
第一节 公平的内涵	(79)
第二节 效率的内涵	(95)
第三节 公平与效率的交互同向促动关系	(104)

第五章 国家、制度、阶层、技术与公平效率	(115)
第一节 国家理论综述及对国家本质的探讨	(115)
第二节 制度的本质、功能及演化	(121)
第三节 阶级的形成和划分及其在社会演化中的机能	(131)
第四节 技术及技术进步	(139)
第五节 国家、制度、阶层和技术分析框架的整合	(145)
第六章 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公平效率演化的历史考察	(157)
第一节 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公平效率演化	(158)
第二节 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分配	(174)
第三节 资本主义知识经济的兴起与生产分配模式的变革	(184)
第四节 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和分配模式变革	(195)
第七章 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实践中公平效率演化的历史考察	(202)
第一节 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公平效率的历史演化	(203)
第二节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历程及其历史经验	(213)
第八章 公平效率关系的实证研究	(236)
第一节 公平效率研究中的基本实证方法简介	(237)
第二节 关于经济增长与不均等关系的实证研究综述	(245)
第三节 我国国内收入分配的实证研究	(253)
第四节 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实证研究	(262)
第九章 我国实现公平与效率良性促动的基本政策建议	(306)
第一节 我国社会公平的现状	(306)
第二节 对我国社会主义公平属性的认识	(316)
第三节 我国实现公平与效率良性促动的基本政策取向	(323)
参考文献	(332)

引 论

人类自诞生以来就面临着有限的生产力水平与满足人们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基本矛盾,如何通过发展生产来满足人的物质和精神需要,成为人类社会一个永恒的基本命题。这个命题又可分解为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如何克服有限的资源和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以创造出更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二是如何将创造出来的财富以一种公平合理的方式在人们之间进行分配。前者主要体现为人类生产的“效率”概念,而后者主要体现为社会分配的“公平”概念。所以说,“效率”和“公平”是人类社会数千年来所追求的共同目标,也是执政者和民众所普遍关注的核心问题,当然也就成为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就价值判断方面的基本命题。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联合国开发署每年的《人类发展报告》和世界银行围绕“发展”这一主题进行的开创性研究,把世界各国政府决策层和学界更多的注意力进一步转移到“公平”和“效率”这个基本命题上来。

然而,涉及公平和效率这一事关人类基本利益的创造和分配问题时,社会科学的阶级性也最集中地体现出来。所以,这一命题又是一个众说纷纭、争论不休的难题,以致被称为社会科学中的“歌德巴赫猜想”。这一问题,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更是备受社会各个阶层关注、而又认识较为混乱的基本问题,其争论往往关系到改革开放的成效评价和发展方向,因而也是理论界和实践领域中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本书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对公平和效率命题进行深入探讨,并希望就这一“歌德巴赫猜想”提出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解释性观点:一是公平和效率各自的本质和准确内涵究竟是什么;二是在人类社会历史演化中,公平和效率究竟是什么关系以及在历史演化过程中具有怎样的内在机制和规律;三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的效率和公平进行回顾和评价;四是我国下一步在基本政策层面上应该如何正确对待公平和效率。

关于本书研究方法的几点说明:

1. 重返古典政治经济学综合分析的学术传统,把生产力(主要体现为科学技术)、国家、制度、阶层、收入分配、道德和激励等分属于当代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的研究内容和方法有机整合起来,用于分析公平和效率这一人类社会中最基本的一对命题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动态演化,朝着把经济学回归为真实、统一的社会科学方向作粗浅的尝试。

2. 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基本方法论,自始至终贯彻了物质决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这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将其具体化为公平效率演化的具体形式和规律。

3. 把有思想、有价值判断的人作为经济学中的行为主体,在对人的本质、人的经济行为的科学认识基础之上,探究人类社会经济现象背后的客观规律,探究公平和效率之间的相互关系及演化。

4. 通过对思想学说史的回顾梳理来追本溯源,通过对当代政治思想、经济理论和管理科学中代表性观点的评析来开拓理论视野,通过厘清概念和逻辑论证进行理论创新,通过对人类社会公平效率演化的历史考察进行历史检验,运用当代国际、国内有关统计数据计量检验。以理论分析和逻辑论证为主,重在从理论上深入阐述公平效率命题,并辅以实证性的历史和计量分析以验证之。

本研究的局限性:对于公平效率命题从政策实践层面研究、论述不够,对我国当前的国有资产转让、教育管理运行机制、医疗卫生保健、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等社会公平问题未能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致使全书在社会公平和效率这个极具现实意义的问题上有空泛议论之嫌。原因:一方面,本研究的出发点和重点主要定位于对公平效率进行理论分析和历史考察,着重从理论和思想认识上剔除公平效率消长论、冲突说的消极影响,力求使执政者和民众更加自觉主动地践行社会公平,通过实现社会公平,来实现公平和效率之间的良性促动和良性循环;另一方面,笔者本人未能就如何促进社会公平这个现实问题进行深入的对策性研究和调查。笔者希望今后能有机会在这方面进一步深入调查研究,密切联系我国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可操作性较强的政策建议。

第一章 公平与效率思想的历史溯源

人们对公平和效率的认识,是与人类的思想发展史同步前行的。在人类思想的启蒙时期,在还没有发现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之前,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往往表现为神话的形式。面对变化无常、无法抗拒的自然界以及世代传承下来的现世社会,人们从神话传说和宗教中寻找着问题的答案。神话和宗教所要解决的,首先是令人类感到恐惧和困惑的大自然现象,如雷、电、雨、太阳等与人类命运休戚相关的自然力量,然后是包括人世间社会关系在内的世界秩序以及这种秩序所隐含的善恶和惩戒。人类各个文明几乎都经历过为了取得诸神的庇护、摆脱自然界和现世社会的厄运,而敬拜诸神的童年期。

公平作为人类善恶标准的一个重要内容,一开始也是出现在神话传说中。关于公平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30 世纪的古埃及,在当时的民间交往中出现了公平神——俄赛里斯。公平神负责对死人评判,判断死者善恶的依据在于死者生前是否勤于稼穡。公平神的权威在国王(法老)之上。^①公平概念的最初出现就体现出以下两个特点:一是公平源于人的劳动实践;二是公平体现着社会生活秩序的最高原则。

在埃及古文字中,“公平”一词最初是用一根半尺长的木杆来表示的,这是丈量土地的标准尺度在原始文字中的形象反映。在希腊古文字中,公平也是用一根直线来表示。由此可见,“公平”一词的产生是同平等分配联系在一起的。在中国古代,“公平”一词的最初发生,体现了人们交往中对平等权利和维护公众利益的道德要求。据《韩非子·五蠹》篇所载,在黄帝时代的史官仓颉造出的文字中,“公”字即有“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的意思。

当人类随着实践的发展,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开始有了较深入的认识,

^① 参见夏文斌:《走向正义之路——社会公平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8 页。

而刚刚从对神话英雄的依恋中独立出来时,他们所关注的主要是物质世界的本原、构成以及存在的状态(变化还是恒一)^①,如中国老子的道家思想和古希腊智者学派之前的哲学思想。此时,公平的概念主要是表现为一种自然界的和谐和均衡。如毕达哥拉斯认为:公平是数的某一种推理,是天平秤上的平等。在中国的同时期,也有关于自然界的公平和谐思想,如《管子·形势》中关于“天公平而无私,故美恶莫不覆;地公平而无私,故小大莫不载”的论述。

当人类的思想先驱们摆脱了神祇的困扰,或者在神祇的语境中尝试解决了世界本原、构成及其运行规律之后,逐渐把注意力转向人类社会自身,公平理论也就开始形成一种系统性的思想,并主要体现了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第一节 西方思想史中公平效率思想的演化

一、古希腊智者学派的公平效率思想

在古希腊,公元前5世纪前后的智者学派推动了公平思想由神话向人世的转变,他们或作为游历教师或作为出访使节由外邦来到雅典。不同的文化背景,使他们对雅典的思想文化进行一种新的审视,并提出一些尖锐的问题。他们的思想迫使雅典人考虑自己的观念和习俗是基于真理还是基于传统,希腊文化是基于人为的规则还是自然,宗教和道德规范是依照传统的从而可变的、还是自然的因而是永恒的,从而对社会本身进行了更加深刻和细致的探讨。

以相对主义、实用主义和对权威的质疑为主要特点的智者学派,对于人世间的公平正义概念也持有类似的态度。在智者普罗泰戈拉那里,人们尊重传统和法律,并不是因为这些法律和传统是正确的,而是因为这样可以维持社会稳定和秩序。而塞拉西马柯更是朝着实用主义和反叛权威的方向跨出了一大步,断言不正义比正义的生活更可取,不正义不仅是在小偷这种可怜的水平上获利,而且尤其对那些将不正义推行到完善程度的人有利,并使

^① 也正是对物质世界的本原、构成以及存在状态的深入探讨,促使人类从对神话英雄的依恋中摆脱出来,人类从神话中摆脱出来与对自然界认识的深化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

他们成为城邦或国家的首领^①；法律是由统治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制定的，“正确”的东西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都是代表更强大的集团的利益。

智者学派所引发的对传统宗教和伦理道德的破坏性分析，最终招致古希腊主流社会的指责和排斥，柏拉图将智者学派称为“销售灵魂食品的商人”^②。

二、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公平效率思想

苏格拉底是介于智者学派和柏拉图之间的过渡性人物。苏格拉底虽然同意智者学派关于“沿袭旧俗的时代已经过去，个人的独立判断必须代替权威”这一论断，但他坚持真理和理性的绝对性，并坚定地追求真理。他认为知识是获得“善”的基本途径，认识“善”就是“行善”；公平是一种美德，这种美德就是知道在特定环境中如何行动，知道如何行动就是知道在何种情况下如何做是最好的；无知使人不能了解真正的幸福和正确的行为。作为一个社会的成员，公民的美德就在于学有所成，尽其本分而贡献于社会。而一个理性的公平社会就是“个人各献其能，各尽本职”。

柏拉图在人类思想史上的巨大贡献是尝试着将在他之前分散的哲学关注点，置入一个统一的连贯的知识体系中。柏拉图生活的时代，雅典民主制已经发生了危机。奴隶主民主派与贵族派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柏拉图坚持了奴隶主贵族的立场，坚持人们之间不平等的奴隶主等级制，认为奴隶不能算是人，只是会说话的工具。其思想承继了许多不同的来源，从苏格拉底那里，他接受了贤人政治的主张和对道德教育的首要关怀；从毕达哥拉斯那里，他接受了万物按数的比例相互调适、彼此补偿以达到和谐的信念。将二者思想有机结合，就构成了柏拉图的圣哲之王领导下的社会分工合作、各尽本分、互不干扰的“理想国”理念。

柏拉图对理想社会的追述，起始于他在《理想国》(*Republic*)一书中追问的问题：“什么是正义？”这个问题的提出开创了西方社会的政治哲学。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只要它的成员开始对社会制度安排进行反省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会不可避免地提出来。在柏拉图这里，他继承了智者学派关于“社会安排不是一个自然现象，而是人们的创造物”的基本观念，既然社会制度是被人制定的，那么就可以被人们改变。这一基本逻辑，为包含了公平评价的社

^① 民国时期李宗吾的厚黑学思想与此相似。

^② [美]撒穆尔·伊诺克·斯通普夫、詹姆斯·菲泽：《西方哲学史》，丁三东等译，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2页。

会正义理论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

柏拉图承认社会存在着贫富分化,认为贫富分化是纷争的根源,城邦中存在着两个国家,“一个是穷国,一个是富国,总是在互相阴谋对付对方”^①。他首先揭示了社会分工这个事实,指出了它的效率含义,以及由于经济的不平等所造成的某种类型的阶级斗争。但他没有将这种贫富分化归结于奴隶主阶级的特权等级制,而是归结于统治者阶级个人的财产私有。他不反对一般公民的财产私有制,但主张在统治阶级中施行共产共妻制,放弃私人财产和家庭生活。因为私有财产必然在统治集团内部导致贫富分化和“自私”的党争,而自私主要由于家室妻儿之累所致。治国者以及辅助者热衷于私家生活,就妨碍其为国民谋求幸福的目标。

在社会分工论和等级论的基础上,柏拉图论述了他的公平正义观。^②他认为,一个城邦国家由三种类型的公民组成:政治家以其智慧治理国家,军人以其勇敢保卫国家,劳动者以其劳动产品供给国家。而当每个人都能在国家中执行一种最适合自己天性的职务,并且各司其职、各守其序、各得其所而不互相干扰时,就像合奏乐曲一样使所有的琴弦都和谐一致,那么整个国家和社会就实现了社会公平与和谐一致,也就实现了效率原则。反之,如果农夫、手工业者和商人想挤进武士的行列,武士想挤进统治阶级的行列,三个等级相互攘夺,互相越位,那就是不正义,不仅无效率可言,而且还会毁掉整个国家。^③

三、亚里士多德的公平效率思想

作为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思想史中的最高峰。追随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足迹,亚里士多德也把包括公平的“善”的问题视为社会科学的首要关怀。但在柏拉图那里,理想国就像一个单个的巨人有机体,国家的善等同于个人的善;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第一次把关乎社会及国家善的政治学与关乎人的行为善的伦理学区分开来。

亚里士多德生活在希腊奴隶制度危机时期,这一环境和经历使他更加注重研究探讨政体变革发生的原因,不仅要像柏拉图那样思考什么是最理想的社会体系,而且还要思考什么是可能的以及易于实现的社会体系。他

①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23页。

② 亚里士多德之前的古希腊政治思想中,善、正义、公平等概念之间没有严格的区分,交织在一起,所包含的内容虽不完全相同,但基本内涵是一致的。

③ 参见[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34、138、156页。

坚决反对柏拉图关于废弃私产和家庭生活的主张,他认为公有财产的监护不如私有财产那样仔细,妇孺归公的后果更可怕。理想社会所需要的不是取消私有财产,而是更开明地运用私产。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拥有适度的财产,不仅有助于形成个人的良善行为,而且还有助于造就城邦的稳定秩序。他认为效率的高低、财富的多少并不是导致政体变革的主要原因,平等和不平等才是引起政体变革的主要原因。古希腊奴隶主贵族派和民主派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往往是围绕政体问题进行的。贵族派主张君主制度或贵族制,民主派主张共和制。为了调和这一矛盾,亚里士多德主张由拥有适当财产的中产阶级来统治国家。他认为:在一切城邦中,除了奴隶之外,共有三种成分:极富有的阶级、极贫穷的阶级和介于中间的中等阶级。他说,极富有的阶级常常是逞强放肆,要求在各方面逾越他人,并把政治权利的不平等分配视为正义;相反,极贫穷的阶级往往懒散无赖,易犯小罪,但又自恃是自由人,便要在一切方面都要求绝对平等。他认为,这两派的主张都不是正义。亚里士多德赞扬第三等级,即中产阶级,认为他们人数较多,占有一份适当而充足的财产。惟其财产适当,所以不至于为富不仁;惟其财产充足,所以不会像穷人那样图谋邻人的东西;惟其人数较多,所以这一阶级就能平衡富有阶层和贫穷阶层的势力,而使得城邦少受党争之祸。以中产阶级为基础的共和政体才是最好的政体,这种政体下的社会无疑是秩序好、效率高。^①

关于公平,在“人不能自足因而天生是社会性的动物”这一基本论断的基础上,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是指人们在社会关系中所产生的一种美德,正义就是平等。正义和不正义含有两种意思:一是指能否服从法律;二是指一个人所取得的東西是否是他应该得到的。前者是指总体的正义,后者是指具体(或个人)的正义。法是为社会利益,或在德性和类似的意义方面属于社会上最好或先进的公民的利益,而要求所有臣民来遵守的。从公共利益的观点来看,一切德性都包括在正义的概念中,服从法律就是普遍的正义。^②

个别的正义又分为分配的正义和平均的正义两种。所谓分配的正义,就是求得分配比例的相称及比值相等。这种正义是从人的不平等性出发的,而这种不平等性是自然造成的,是固定不变的。至于平均的正义,即是指在平等人与人之间个人所得在数目和容量上的相等及数值相等。这种正义以人的等价性为依据,使互相利益等同。对这两种正义应根据具体情况,在某

① 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05~206页。

② 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32~133页。

些方面应以平均正义为原则,而另一些方面则应以分配的正义为原则。

而就城邦的政体这种政治权利的公平,则体现为赋予平等的人以平等的权利、不平等的人以不平等的权利,是平等与差别之间的一种均衡和中庸。亚里士多德认为,要求民主制的那些人,认为在某一方面平等的人在所有方面都是平等的;另一方面,寡头政治认为那些在某个方面不平等的人在所有方面都是不平等的。公民在个人能力、财产条件、出身和自由方面有所不同,公平则要求根据这些差别来对待他们。^① 因此,他认为公民权不应是完全平等的。^② 他不相信劳动者可以成为公民,因为他们没有时间,他们的心智也没有得到适当的发展,他们也不能够从参与政治过程的经验中获益。^③

四、古希腊后期的公平效率思想

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古希腊思想流派,虽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不能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相提并论,但在与人类社会实践紧密相关的公平理论上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在外来强大的政权武力的侵袭压制下,古希腊城邦制度陷于解体。这一巨大的社会变革给古希腊思想者以巨大的思想冲击:社会动荡中高贵的希腊贵族顷刻之间国破家亡,“唯我独尊”的奴隶主贵族等级观念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亚历山大帝国中不同民族和文化同存于广大的疆域内,并受制于同一个政治权威的事实,使人们开始反思不同民族、不同等级之间不平等关系的合理性,开始质疑非人待遇的奴隶制度,逐渐产生了人类平等的思想;看到亚历山大帝国和罗马帝国的强大国力和伟大规模,摒弃了对城邦的赞美。于是以斯多葛学派为代表的世界主义思想便应运而生,成为比较有影响力的流派。他们突破了地域和民族之间的歧视和不平等,追求世界国家的理想,并认为整个人类具有共同的基本属性,因而也就具有了共同的法律基础,那就是人人皆为平等的自然之子、人人皆秉有一份自然本性。

① 亚里士多德用以分析社会结构的概念极为丰富,但只把奴隶视为会说话的工具,只能算是家庭的基本要素之一,故在城邦这样一个自由民的共同体结构中没有任何地位。在奴隶制的问题上,他的见解远远落后于某些智者。他不仅肯定了这种当时有教养的希腊人的共同偏见,而且还为奴隶制的所谓合理性作了貌似学理的辩护:“非常明显,世上有些人天赋有自由的本性,而另一些人自然地成为奴隶,对于后者,奴役既属有益,而且也是正当的。”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6页。

② 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47~148页。

③ 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66~367页。